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文学与革命的纠葛

吴述桥/马俊江 著

——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纠葛



吴述桥

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网络文学及语文研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成果多次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现主持国家课题1项，已完成博士后基金课题和浙江省教育厅课题各1项。



马俊江

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鲁迅研究月刊》《新文学史料》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成果多次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

文学与革命的纠葛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

吴述桥 马俊江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与革命的纠葛: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吴述桥,
马俊江著.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20.1
(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高玉主编)
ISBN 978-7-5178-3500-4

I. ①文… II. ①吴… ②马… III. ①中国文学-现
代文学史-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22193号

文学与革命的纠葛——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

WENXUE YU GEMING DE JIUGE — 20 SHIJI 30 NIANDAI WENXUESHI

吴述桥 马俊江 著

策划编辑 郑建
责任编辑 唐红 谭娟娟
封面设计 王辉 张俊妙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198号 邮政编码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庆春籍研室
印 刷 杭州高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3千
版 印 次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3500-4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总 序

当今文学教育主要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本科教育是这样，研究生教育也是如此。在学科分类和学术研究中，文学史都是文学中最重要的内容，没有之一。在某种意义上，文学史涵盖或牵涉所有的文学现象和理论问题，所以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材编写，文学史都将是说不完的话题，文学史作为教材“常编常新”，作为学术“常研究常新”。

大约从2008年起，我和同事们有意编一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并且希望有所突破和创新。这种突破和创新不仅体现在教材内容上，也体现在体例上。我们也希望这能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改革有所推进，避免各种陈陈相因。我发现，很多教材之所以陈陈相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编纂者缺乏对他书写内容的深入研究，因而多是人云亦云，甚至以讹传讹。我们最大的努力就是把教材编写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以此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新鲜的东西，于是就有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研究丛书”这个项目，并于2015年申请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获得通过（编号2014GH006）。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新文学”）“时间段”划分及其模式的问题。虽然说中国新文学发展至今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就时间而论其无法与古代几千年的文学史相提并论，但这百余年与古代的任何一百年都不一样，就其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内容的丰富性（如涉及的材料、文学现象、文化背景交融等）、矛盾的多重性（古/今、中/外、城/乡、传统/

现代等)、作家作品数量上的巨大性(21世纪以来,仅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达数千部之多)等特征而论,它是全新的类型和品质,所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古代断代文学史式的简单叙述不同,需要一种新的研究方式。

同时,百年来的新文学本具有一体性,把它简单地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是适合的,在今天则完全不合适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容上的严重不平衡。现当代文学史在发展上是“自由落体运动”式的,也即文学现象特别是作品在量上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增加的,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密度”很大,内容非常丰富且复杂,但在文学史的版图里却被“压缩”在非常有限的空间里。现代文学仅30年,而当代文学已有70年,且时间上还在向前延伸,这不仅在时间上不平衡,在内容上更不平衡。当代文学内部,由于内容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加上巨大的差异性,笼统地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不可能,笼统地研究当代文学也不可能,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需要分工协作,需要分“时间段”来研究。

事实上,自晚清以来,新文学经历了多次转型,其中既有晚清以降传统向现代的新旧转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当代转折,以及70年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裂变等这样具有“知识型”层面的大的转折,也有像五四时期新文学的发生发展、20—30年代的新文学繁荣、40年代初至1949年的文学发展的区域性分割、“文革”前后文学演变反转、80年代文学的盛世想象、90年代文学的“大转型”等阶段性特征非常明显的时段。如此种种,使得以发展阶段为基础,对其特征进行深入、细致的“史”的研究,成为必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既需要宏观的演变研究,也需要更为细致甚至琐碎的“横断面”的“解剖性”研究。

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初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它的合理性,它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过去三千年文学的新文学的开始,但随着新文学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具有独立性,现代文学在实绩上的确具有巨大成就,伟大作家群星闪耀,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宏观时期越来越

文学与革命的纠葛

——
20世纪30年代文学史

越不合适，它甚至没有纯粹属于自己时代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多跨两个时代，或者从晚清到民国，或者从现代到当代，没有跨越时间之外的叙述，这些作家都不可能完整的。正是从“完整”的角度，本丛书专著“清末民初”文学一册。我相信，将百余年文学发展的自然时段作为分段的依据，这既是一种分期法和对约定俗成的文学现象的认知，也是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的体现。这一体例既能有效避免在现代和当代之间人为强制地划定界限，避免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中各自复杂性的化约，也能更为详细地梳理百年文学的纹理脉络，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百年文学的历史走向。

高玉

2019年10月23日于浙江师范大学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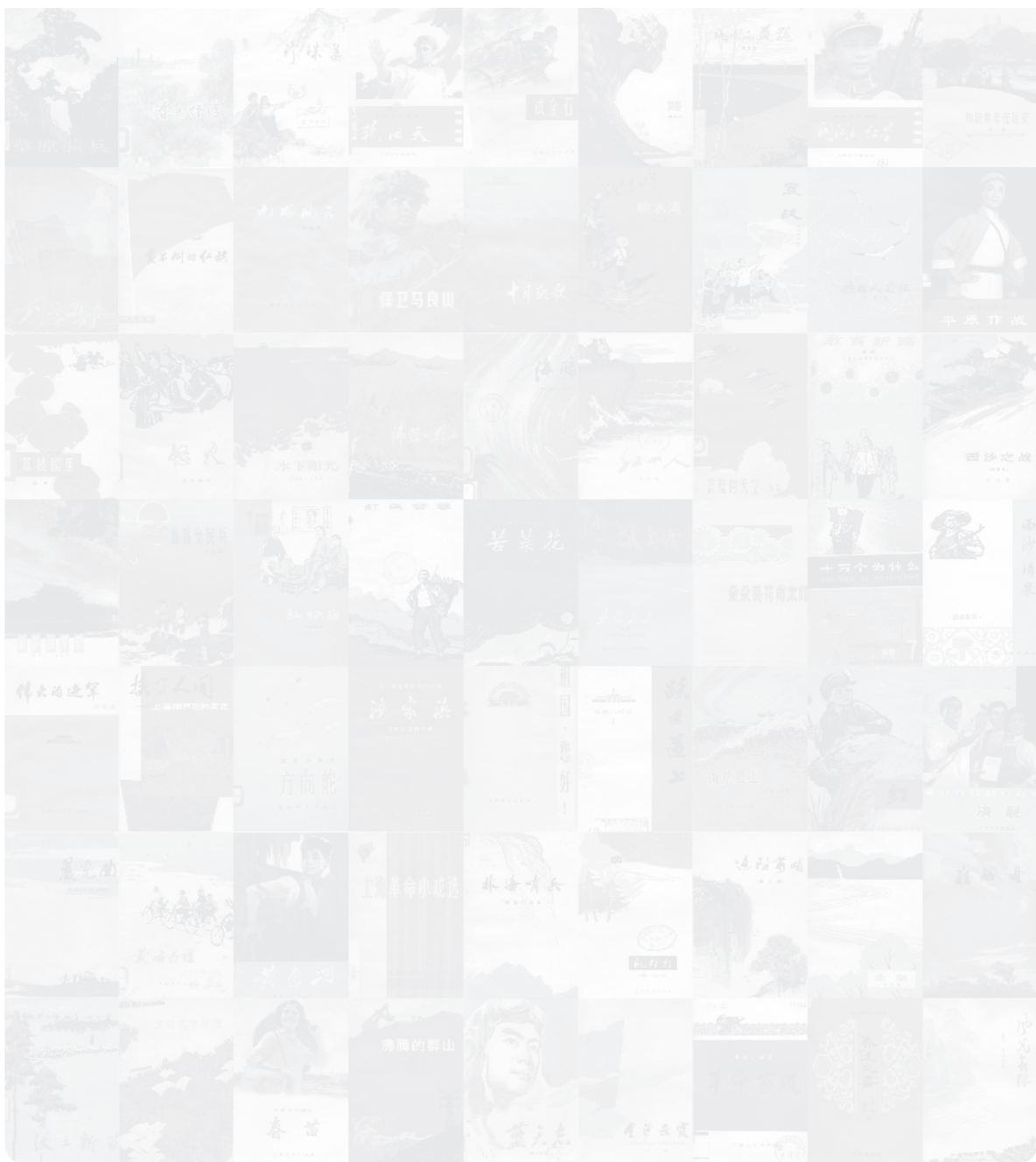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文坛的新局面	001
一、鲁迅南下与文学中心南移	003
二、兴奋、伤痕与愤怒：大革命与文化人	008
三、创造社、革命文学与革命文学论争	017
第二章 革命文学论争与文坛的转折	027
一、社会改造与革命文学的起源	029
二、炸开“乌烟瘴气”的文坛	032
三、断裂或者延续：创造社的“普罗文学革命”逻辑	037
四、从“奥伏赫变”到革命文学阵营	042
五、敞向鲁迅的“窄门”	046
第三章 “左联”的成立及其活动	053
一、“左联”成立之前：共产党与革命作家	055
二、“左联”的成立	059
三、左翼文艺理论的输入	065
四、“左联”的文艺论争	070
第四章 “北方左联”与北方左翼文学运动	079
一、文化空间、文学社团与“北方左联”	081
二、会馆与北方革命文学的兴起	087

三、中学生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	101
四、《文艺地带》与“泡沫社”的缘起	112
五、《觉今日报》、“泡沫社”与流浪青年	139
第五章 左翼的文学创作	151
一、茅盾与左翼小说	152
二、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左翼诗歌	168
三、鲁迅与30年代的杂文	175
四、“剧联”与左翼戏剧运动	179
第六章 京派和海派	189
一、新感觉派与海派小说	190
二、废名、沈从文、师陀与京派小说	198
三、后期新月派和以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	212
四、林语堂、周作人和30年代的小品文	219
第七章 巴金、老舍和曹禺	225
一、老舍和《骆驼祥子》	226
二、巴金和《家》	233
三、曹禺与30年代中国话剧	238
参考文献	247
后 记	252



第一章

文坛的新局面



关于现代文学史的分期，有诸多不同看法，五卅运动就曾经受人关注，被当作文学史发展的一个分界点。20世纪30年代，阿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李何林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都曾将从五四到五卅看作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段。作为一个集体文化工程的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整理保存了五四新文学文献，也可看作是编选者们的集体著史。关于历史分期，《中国新文学大系》最终采用了茅盾的意见，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下限截止到1927年，这也被以后的大多数文学史家采纳。五卅运动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但于文学史而言，它并未产生新的文学理念，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而1927年后，五四白话文运动逐渐结束，左翼文学运动开始浮出历史水面。茅盾在回复赵家璧的信中，将“北伐”看作新文学史的转折点，但并未详细阐释。^[01]我们以为，正是以北伐为高潮的大革命，其兴起与失败，震撼并影响了新文学作家的心态与思想。尤其是大革命的失败，可以说是左翼文学的助产婆，因为在它的刺激下，文



五卅运动

[01] 茅盾原信丢失，赵家璧在回忆录中曾引用部分内容。另外，阿英、茅盾、郑振铎等人对于新文学史分期的不同意见，可同时参看《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收入赵家璧《编辑忆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化界急剧左转，马克思主义从五四的众多外来思潮之一，变为最为文化人热衷的理论武器，左翼文化人和左翼作家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1927年前后，鲁迅的离京南下、大革命的失败、创造社和太阳社挑起的革命文学论争等一系列个人的、社群的、社会的事件，都将文化与政治缠绕在一起，共同成为20世纪30年代文学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一、鲁迅南下与文学中心南移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先到厦门大学，再至广州中山大学，并于1927年9月27日离粤赴沪。此后直至1936年10月离世，鲁迅一直居于上海，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也正好与左翼十年相始终。



鲁迅五十三岁寿辰全家合影

在讲述20世纪30年代文学时，有学者用诗一样的语言描述1927年前后文化界的迁徙与聚集：“全国各地的文化人好像受着神秘的力量驱使似的，他们像候鸟一样成群结队，不约而同地离开他们原来的栖居之地向上海迁徙。”^[01]事实也确实如此：1927年5月，胡适自美国归国，到上海担任新月书店董事长。前一年，新月社主将徐志摩已先于胡适移居上海。胡适到上海的同月，夏衍从日本回到上海。本是不曾写过一篇作品的非文艺工作者^[02]，但到上海后，夏衍走入文艺界，成为左翼剧作家。8月，被国民党通缉的沈雁冰离开武汉，抵达上海。五四时期以翻译和批评为主的沈雁冰，抵沪后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幻灭》，文学史中因此有了左翼小说家茅盾。10月，参加南昌起义的郭沫若几经辗转，由香港回到上海，创造社开始左转。尤其是1928年，后期创造社“五虎将”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彭康和李铁声，以及创造社元老之一的成仿吾诸人，自日本先后归国聚集上海以后，更是挑起革命文学论争，在文坛掀起轩然大波，成为左翼文

[01]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02] 夏衍：《忆阿英同志》，《夏衍全集》第9卷，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学时代的前传或者起点。

考察20世纪20年代后期文化人向上海的迁徙和聚集，我们可以把迁徙人的名单一直这样列下去：沈从文、巴金、冯雪峰、阿英、柔石、叶紫、沙汀、张天翼、丁玲……但不管有多少人来到上海，最重要的那个人无疑是从北京南下的鲁迅。如果说以白话文运动为中心的五四是胡适的时代，那么，左翼的20世纪30年代就是鲁迅的时代。胡适在反击章士钊对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时，曾引用章士钊文章中的一段话：“他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里曾骂一般少年人‘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一味于《胡适文存》中求文章义法，于《尝试集》中求诗歌律令’。”^[01]虽然被骂，但显然，胡适被骂得有点得意，因为章士钊这段话，实际上道出了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军地位。但还有一点更值得注意，章士钊文中那段话的主语是“今人”，而胡适将其改为了“一般少年人”。胡适这一有意或无意的改动，其实也说出了文学运动的秘密：每一场文学运动的主力都是“少年人”，即知识青年或者文艺青年。说五四是胡适的时代，就是因为他抓住了当时一般文艺青年的心；而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坛上，鲁迅成了文艺青年追慕的盟主。

许广平回忆鲁迅时说：“他欢喜青年，不论认识与不认，写信去请教他，没有不详细地回复的，他每星期的光阴，用在（于）写回信大约有两三天。”^[02]1934年，从东北沦陷区流亡到青岛的萧军、萧红分别写出了《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只是“不确切知道我们的小说所取的题材，要表现的主题积极性与当前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否合拍？因为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是当时领导上海革命文学运动的主帅，所以写信给他，请求指导”，^[03]“想不到先生收到我的信却是‘即复’的”。^[04]40多年后，想起这封鲁迅回信，萧军依然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鲁迅先生的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

[01] 胡适：《老章又反叛了！》，《京报副刊·国语周刊》1925年8月30日第12期。章士钊文章刊于1923年8月21、22日上海《新闻报》，署名行严。

[02] 许广平：《青年人与鲁迅》，原载上海《少年读物》1938年10月16日，收入《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3页。

[03]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筒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04] 同上，第21页。

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01] 1934年10月，萧军、萧红给鲁迅发出第一封信；11月，二萧从青岛南下到达上海，来到鲁迅身边。

在谈及鲁迅与文艺青年的关系时，许广平将其比喻为“青年的吸铁石”^[02]。受鲁迅吸引而来到上海的文艺青年也不仅“二萧”。鲁迅虽然在厦门大学 and 中山大学执教都不过短短几个月，但是他给这两所学校的青年学生带来一股文学革新气息。上海十年，鲁迅虽成为职业作家，却有众多“后期弟子”聚集在他周围。20世纪30年代文坛上有名的左翼青年作家，很少与鲁迅无关。如果说参与五四文学革命的鲁迅“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03]，那么20世纪30年代，鲁迅则是热情投身于新文学建设，成为文坛上最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的作家，为左翼文坛“造出大群的新战士”^[04]。

鲁迅到厦门大学时，厦大还是“完全的一个古董学校”，校长尊孔，不许学生写白话文。^[05]而鲁迅到了以后，“尤其是文科学生，掀起了学习文学的热潮”^[06]。鲁迅自己也颇为高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富有生气的表现之一即青年文学社团的出现。在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写道：“我先前在北京为文学青年打杂，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这里，又有几个学生办了一种月刊，叫作《波艇》，我却仍然去打杂。”^[07]鲁迅离开厦大后，王方仁和崔真吾等文艺青年一路追随鲁迅来到上海，并住在鲁迅住所附近。于是鲁迅继续打杂，帮助王、崔及他们的同学柔石成立朝花社，“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

[01] 萧军：《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02]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原载《文艺阵地》1938年10月第二卷第一期，收入《许广平文集》第二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03] 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8页。

[04] 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1页。

[05] 俞念远：《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西北风》半月刊1936年5月第2期。

[06] 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参见鲁迅博物馆选编：《鲁迅回忆录》（散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0页。

[07] 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集》……”^[01]

萧军和萧红抵沪后，鲁迅担心其不熟悉上海的复杂环境，介绍叶紫与他们认识，为其作品推荐出版。当作品被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禁止出版时，三人组成“奴隶社”，自费出版“奴隶丛书”：“稿请先生看过，兼作序，艰难的校对，付排，以及印刷费等等。”^[02]出版以后，鲁迅又负责找书店代销，书没销售出去，鲁迅个人先垫付书款帮助这些困顿的年轻人。当然，最重要的是为这些无名文艺青年的作品作序，向文坛推介：“《丰收》序肯与转载，甚感，因作者正苦于无人知道，因而没有销路也。”^[03]书以序传，三个无名作者在鲁迅提携下，很快成为知名作家。这种情况，让其他地方的文艺青年羡慕不已。20世纪30年代，身居北京的杨纤如也是一名文艺青年，晚年回忆北方左翼青年诗人何菲（原名杨小石）时，将其与殷夫并称为“南北两普罗诗人”。可谈及何菲在文坛与文学史中的遭际，杨纤如说得有些苍凉：“可惜小石不在上海鲁迅身边。”^[04]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1936年鲁迅去世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文艺青年哀悼他。他们不仅痛苦，而且迷惘，像是“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而领路的人忽然不见了，不知道要怎样才好”^[05]。

北京，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让众多文艺青年向往。但鲁迅的南下，无疑让这个城市的吸引力有所下降。沙汀从四川跑到北京，要考北京大学，说“亲自聆听鲁迅先生的教导，这才是我的本愿”。可惜他到北京时，错过了北大考期，“特别鲁迅已去了福建”。^[06]另一个文艺青年张天翼和沙汀的想法一致，“在北大也学不到想要学的东西”^[07]。不久，二人都离开北京，辗转南下到了上海，或写信向鲁迅请教，或投稿鲁迅主编的刊物，最终在这座城市走上文坛，成为知名的左翼青年作家。

[01] 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页。

[02] 许广平：《忆叶紫先生》，原载《大美报·浅草》1939年12月22日，收入叶雪芬编《叶紫研究资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03] 鲁迅1935年3月29日致曹聚仁信，《鲁迅全集》第十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5页。

[04] 杨纤如：《北方左联诗人何菲》，《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期。

[05] 张天翼：《哀悼鲁迅先生》，《中流》半月刊1936年11月第1卷第5期。

[06] 沙汀：《沙汀自传——时代冲击圈》，北岳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4页。

[07] 张天翼：《作家自述》，《中国现代文艺丛刊》1980年第2辑。

讨论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各地文化人向上海迁徙的话题，我们曾说鲁迅的南下最具文学史意义，但如果我们将关注点从文化人转移到他们的出走之地，无疑，五四文学革命大本营的北京最值得注意。离开北京的不仅有鲁迅和追慕鲁迅的文艺青年，还有更多的文化人在这个时间段离开这座城市，仅北大，就有 29 位教授向南迁徙。较早南下的是林语堂。1926 年 5 月林语堂到厦门大学出任文科学长，邀请鲁迅、孙伏园、沈兼士、章川岛等人到校任教。但问题是，从北京



孙伏园

南下厦大的不仅有孙、沈和章这些鲁迅的朋友，同时还有鲁迅在北京的老对手，以致鲁迅觉得“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顾颉刚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01]。鲁迅本与厦大签了两年的合同，但《现代评论》诸人先后到校，使鲁迅在厦大有点度日如年，“到此未及一月，却如过了一年”^[02]。所以，虽然沈兼士、孙伏园和章川岛等《语丝》同人也先后南下来到厦大，但任教三个多月后，鲁迅还是离开了厦门。

后五四时代，《新青年》南迁上海。新文学阵营也随之分裂。围绕《语丝》和《现代评论》两份杂志，两个在文化、政治观念上有显著差异，甚至对立的文化人群体形成：一个是以鲁迅和周作人为核心的语丝派，一个是以胡适为领袖的现代评论派。北京这两份最重要刊物及其相应的文人群体，在当时的文化界都卓有影响。但随着文化人的离京，两份杂志也先后南迁上海，时间都是 1927 年。十年前，陈独秀携《新青年》北上，北京成为全国的新文化中心，南方热衷新文艺的青年，也都纷纷北上，聚集北京；十年后，鲁迅诸人和《语丝》等刊物南下，文学青年也随之南迁。失去了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和刊物，以及热衷文艺的年轻人，北京风光不再，成为寂寞的古城。

北京与上海同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中最重要的城市，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半就是它们的“双城记”。但 1927 年前后，

[01] 鲁迅 1926 年 10 月 16 日致许广平信，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75 页。

[02] 鲁迅 1926 年 9 月 30 日致许广平信，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58 页。

大批文化人的离京赴沪，使上海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成为新时代的文化中心。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学，也将在此兴起。

二、兴奋、伤痕与愤怒：大革命与文化人

北京的文化人为什么会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集体离京南下呢？北京和南方发生了什么，决定了他们的选择？

1926年6月，鲁迅已决定南下，在写给李秉忠的信里，鲁迅提到了选择南下的目的：

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但这也难说，恐怕仍要说话），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因为靠版税究竟还不够。……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01]

1925年8月，鲁迅因支持女师大学潮，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职务，鲁迅与之法庭相见。1926年3月，官司以鲁迅获胜而告终，但经过七个月的鏖战，估计鲁迅早已不留恋这份职务。更何况，北洋军阀连年内斗，公职人员常常拿不到薪水，所以，一直为养家所累的鲁迅，为生计选择南下也无可厚非。但作为偶然事件的个人选择固然值得历史学家关注，与个人选择相联系的时代风云更需要考察。“仍要说话”和渴望“热闹的地方”，是鲁迅个人的性情，但恐怕也联系着他对于南北局势的认识：北方舆论环境恶劣，“说话”也难；南方才是“热闹”的地方。

“不愿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的《语丝》杂志，“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02]。而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从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尤其是发生了“三·一八”事变，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政府第一次对学生举起了强权镇压的刀枪。虽然惨案发生后，迫于舆论压力，段祺瑞下野，但接

[01] 鲁迅1926年6月17日致李秉忠信，参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页。

[02]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三闲集》，《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